山西青铜文化

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

康艳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西青铜文化

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

康艳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青铜文化 ：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 / 康艳著.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314-8510-0

Ⅰ. ①山… Ⅱ. ①康… Ⅲ. ①青铜器(考古)－装饰－研究－山西 Ⅳ.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0017号

出 版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110001
发 行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沈阳晟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
字　　数：150千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彭伟哲　林　枫
书籍设计：林　枫
责任校对：郝　刚
书　　号：ISBN 978-7-5314-8510-0
定　　价：49.00元

邮购部电话：024-83833008
E-mail: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24-23835227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目录 >>

:: 绪论 ····· 001

:: 引言 ····· 004

:: 第一章　三晋文明源远流长 ····· 006

1.1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 007

1.2　晋国伟业奠定了山西文明的基石 ····· 010

1.3　晋国崛起 ····· 011

1.4　晋阳文明 ····· 012

:: 第二章　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 ····· 015

2.1　山西商周青铜器 ····· 016

2.2　山西商周鸟形青铜器 ····· 018

2.3　山西商周鸟形附件青铜器 ····· 030

2.4　山西商周鸟纹装饰青铜器 ····· 043

:: 第三章　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艺术分析 ····· 061

3.1　概述 ····· 062

3.2　山西商周鸟形青铜器艺术分析 ····· 063

3.3　山西商周鸟形附件青铜器艺术分析 ····· 065

3.4　山西商周鸟纹装饰青铜器艺术分析 ····· 066

:: 第四章　山西商周青铜器鸟装饰艺术溯源 ----- 071

4.1　概述 ----- 072
4.2　新石器时代鸟装饰艺术 ----- 072
4.3　商代青铜器鸟装饰艺术 ----- 076
4.4　西周青铜器鸟装饰艺术 ----- 080
4.5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鸟装饰艺术 ----- 083

:: 第五章　山西商周青铜器鸟装饰艺术的文化内涵 ----- 086

5.1　概述 ----- 087
5.2　“鸟”的文化内涵 ----- 087
5.3　山西商周青铜器鸟装饰的文化内涵 ----- 090

:: 第六章　山西青铜文化 ----- 094

6.1　三晋青铜华彩 ----- 095
6.2　山西青铜器的地域分布 ----- 096
6.3　山西青铜器铸造与装饰工艺 ----- 099
6.4　山西青铜器的文化因素 ----- 108

:: 结语 ----- 115

:: 参考文献 ----- 11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中国青铜文化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未曾断代而持续至今的漫长文化中的第一阶段。山西作为人类文明特别是文明时代的发祥地，其青铜文化是商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尤其是晋墓出土的青铜器光彩夺目，风格独特。山西的青铜文化可追溯至夏，形成于商，成熟繁盛于周。随着晋国的崛起，山西青铜器不论是艺术理念还是工艺设计和铸造技术，都开青铜艺术改革风气之先河，它取法自然，在浑厚肃穆中增添了灵巧秀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于列国青铜器中自成体系。

青铜器的纹饰是青铜器断代、分区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鸟是青铜器装饰题材中十分多见且重要的一种。因此作者以鸟形、鸟纹为装饰的青铜器为标本来分析山西青铜器的地域特点，以及其发展衍变的规律，进而揭示山西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山西文明添砖加瓦。

鸟是青铜器装饰题材中重要的一种。青铜器鸟装饰研究的成果也异常丰硕。根据文献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闻一多、郭沫若、孙作云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凤鸟概念和起源的考辨。郭沫若先生著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其对鸟纹特别是凤鸟纹做了详尽的分类。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鸟纹始于容庚先生，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张光直、陈梦家、李学勤、陈公柔、张长寿等。其中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又叫《殷周青铜器通论》）第六章《花纹》，将青铜器的凤鸟纹分为鸟纹、凤纹两类。他认为鸟纹流行并普及于商及西周，商代鸟身短，尾垂；西周鸟身长，尾多上卷。凤纹则始于商末，而盛行于西周。然而在整理和收集资料中笔者发现，商代也有鸟身长的直尾鸟纹，而西周也有鸟身短的垂尾鸟纹。青铜器中鸟纹图案与器物的装饰位置也有密切的关系。装饰在器物中心位置的鸟纹，或者是主要以鸟形做器的鸟，繁复丰满。而装饰在器物次要位置的，或者作为器物部件的，则为了适应装饰空间和器物部件的实用和美观而相应的简略一些。陈梦家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殷代铜器》和《西周铜器断代》，从断代学的角度讨论鸟纹。他把鸟纹分为三类，指出：一是成对的小鸟；二是成条的长鸟；三是单个的大鸟。小鸟通常是次要的带纹，而大鸟则占据青铜器腹部的显要位置。并且还提到器形对纹饰的影响。陈公柔、张长寿的《殷周青铜器上的鸟纹断代研究》关注了器形对纹饰的影响，基本采取了陈梦家的分类方法。根据辅助纹样、主体纹样、另一种辅助纹样把鸟纹分为小鸟纹、大鸟纹、长尾鸟纹3型25式。李学勤先生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一文中讨论了陕西出土的青铜器的断代问题，同时也对鸟纹做了分析。“他认为徽史家族铜器群中的丰尊、丰卣是穆王时器，器花纹为垂冠的大鸟，而与此花纹相近的小樽、小卣、公尊、公卣、静卣、

孟簋等，都是穆王时器。”[①]国外学者对青铜器鸟纹也青睐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瑞典学者高本汉的《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分析了1200多件铜器的装饰纹样，根据鸟纹的尾巴把凤鸟分为分尾的长鸟和不分尾的鸟纹。他对鸟纹的分类是根据鸟纹的文本，一种是分尾的长鸟，一种是不分尾巴的鸟。他所论述的这些鸟纹与器形与共存花纹的关系，以及其年代等都是值得借鉴的成果。日本林巳奈夫（旧译林巳耐夫）的《凤凰图像之系谱》论述了鸟纹的发展序列，并列举其形式分别说明其年代，对鸟纹饰做了初步的分型和断代。[②]国内外对青铜器鸟装饰艺术的研究历史悠久，而且有较深入的探讨。这些成果都是值得笔者借鉴的宝贵财富。山西青铜器以鸟作装饰的作品丰富而且精品百出，艺术成就颇高。赵瑞民和韩炳华编著的《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晋系青铜器的形制、分期与断代、器形的演变、器物组合研究和晋系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张明远的《论晋国赵卿墓鸟尊艺术》中通过对赵卿墓鸟尊的研究，从而总结出山西鸟形青铜器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由于研究的方向不同，赵瑞民老师的著作中晋系青铜器的纹饰没有被作为主题进行研究。张明远老师则主要针对鸟形青铜器进行研究。

现今可以收集到的晋国鸟装饰的青铜器有鸟形器、鸟形附件和鸟纹装饰青铜器，数量可观。本文借鉴前人的一些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山西鸟形器、鸟形装饰及鸟纹装饰青铜器的整理、分析和研究从而总结它们的艺术特点，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从而让人们了解山西的这些青铜器艺术精品，它们是山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很多艺术珍品却鲜为人知。作为山西人，我希望通过对这些艺术精品的介绍，让人们认识山西青铜器，进而了解古老悠久的山西文明。

① 晋海燕：《商周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再思考》，《民族艺术》2007年4期。

② 林巳耐夫：《凤凰图像之系谱》，《考古学杂志》第52卷1号，1966年7月。

引 言 >>

鸟是青铜器装饰的重要内容之一。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是中国乃至世界青铜器装饰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其精品迭出，器形丰富：多见卣、尊、鉴、壶等。它们取法自然，形象活泼、逼真，神韵十足。然而尚无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本文将试图对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进行初步的研究。

（1）笔者对山西鸟做装饰青铜器实物进行数次考察，并对其进行测量、拍照、制图、整理。由此发现这些鸟装饰青铜器有三种装饰样式：鸟形器、鸟形附件和鸟纹装饰青铜器。其中鸟形器3件：卣1件、尊2件；鸟形附件装饰共有5件：笄形器1件、壶2件、筒形器1件、盉1件、工艺品1件；鸟纹饰装饰青铜器15件（同一款识的不重复计数），其中卣2件、盆1件、尊2件、鉴2件、壶4件、罍2件、盉1件、銎斧1件（此器物抑或归于鸟形附件）。这些青铜器物的时间上下限为，商到战国时期；出土的地理位置分布，商代晚期主要以吕梁山一带的方国遗珍为主，以石楼县居多；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及长治县出土者居多。

（2）在此基础上，笔者用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艺术分析。由此发现这些鸟装饰青铜器上承商代青铜器装饰风格，在不断的发展和衍变中逐渐形成浑厚又不失灵巧、秀丽；写实又充满浪漫情调的艺术风格。商和西周初期以浑铸为主，也采用分铸法；之后分铸法的大量运用使得局部的装饰更加灵活、多样。鸟装饰手法早期主要是模印和刻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镶嵌、镂空等新工艺。因而这一时期的鸟装饰青铜器更为活泼、灵动。

（3）翻阅古籍以及文献资料，结合前人优秀研究成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山西青铜器鸟装饰的起源、发展、衍变进行梳理；以求进一步探索山西青铜器鸟装饰的艺术特点和审美内涵。我国鸟装饰艺术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不少优秀艺术典范。商代鸟装饰青铜器主要摹写鸮鸟和凤，多见鸟形卣和尊：卣通常是双鸮背立，尊为单个鸮鸟形象，以中轴对称。西周流行凤鸟装饰，尊更为多见，以凤鸟做器；鸟形附件所肖鸟形羽冠低矮为圆形，器物表面纹饰精美，主从有致。春秋战国时期，写实的鸟和几何化的鸟并存，鸟的形象动感十足。

（4）通过对山西鸟装饰青铜器造型特点和工艺特点的分析和整理，可以初步推论这些众多的鸟形青铜器、鸟形附件及鸟纹装饰青铜器可能是商周人鬼神崇拜观念的物质反映；可能是祈福和祭祀所用的礼器；从这些鸟装饰青铜器的造型特点和装饰风格又可以推论晋人是周文化的直接继承人；春秋战国时期相互缠绕、搏杀的变形鸟纹——夔凤纹，应该是当时社会大变革时期战争兼并的社会生活写照。

第一章　三晋文明源远流长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1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山西简称晋，又称三晋，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厚重大气磅礴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早在180万年前西侯度人就生活于此（今山西省芮城县内）。在西侯度遗址（图1-1），考古发现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图1-2～图1-4），说明180万年前的山西人已将“火神”征服在脚下，显露出“万灵之灵”的神韵。约10万年前丁村人（图1-5～图1-7）狩猎野兽、采集野味野果，生息繁衍于此（今山西省襄汾县）。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也留下了生活的足迹；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据历史研究，“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的三都都在晋南。因此，可以说山西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①]。



图1-1　西侯度遗址



图1-2　西侯度一百八十万年猿人头复原像

华夏文明与农耕文化息息相关，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地理环境封闭，是绝佳的文明孵化场。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形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形，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300米不等。有三条主要河流纵横其间，西部沁水，发源于沁源二郎沟，由北向南流经沁源、安泽、沁水、阳城、沁阳，南入黄河。途中汇集了十几条小的河

① 王克明：《华夏文明起河东》，三晋出版社，2012年。



图1-3　西侯度人用火场景



图1-4　西侯度遗址动物骨骼化石

流，北部有浊漳水，发源于长子县发鸠山东麓，由西曲折向东，中汇绛水、涅水、清漳水，流经长治、襄垣、潞城、黎城、林县、安阳等地，东流入海。中部有丹水，发源于高平市丹朱岭，由北向南，汇绝水、泫水，流经晋城，南入黄河。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濩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适于渔耕，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在太行、太岳之野，民间还流传着大量关于炎帝的传说以及对炎帝的祭拜。炎帝姓姜，是古羌人的一支。“羌”“姜”二字都从“羊”。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羌”字就是一个人装饰有羊头的形状。在上党地区[①]普遍存在崇拜羊的习俗。传说炎帝尝百草，是让羊先尝的。羊吃了没事，然后人才尝。高平羊头山上的碑座，不是像一般碑座那样，雕成所谓“龟驼碑”的形状，而是雕成一只硕大的羊。上党地区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必须蒸面羊，而且羊身上披满谷穗，和面掺黍米面，用豆做眼，麦粒做唇。一头面羊麻黍稷麦豆五谷俱全。显然这与炎帝神农氏发明五谷的传说是相关联的。孩子过满月时，姥姥、舅舅家要送五只大小不同的面羊，据说是取“伍”的谐音，表示与羊为伍。大羊的头下有一把锁，用红线把三枚古铜钱套在羊脖子上。另捏拴羊石一块，意思是把羊拴住。羊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孩子的替代物，这种习俗显然与原始时代的羊图腾崇拜有关。在方志中，我们也发现了太行、太岳之野大量与炎帝有关的记载，如《元和郡县志》卷十五

① 山西东南部古地名，古潞泽辽沁四州一带，是由群山包围起来的一块高地，东部依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为界、西部依太岳山和中条山与晋南(也称河东)接壤，《释名》曰：“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

《长子县》：“神农城，《后魏风土记》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高平县》：“羊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海经》云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象羊头。”又说：“炎帝庙在县（高平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卷四十五《上党县》也说：“羊头山，《郡国记》云：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又有散盖，即神农尝谷之所也。”又说：“神农井在县（长子县）南五十里，出羊头山小谷中。《上党记》云：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一清一白，甘美，呼为神农井。”顺治《潞安府志》卷一《长治县》：“百谷山，在郡东北十三里，神农尝百谷于此，立庙祀之。”据统计，这一地区与炎帝有关的遗迹有十九处之多。可以看出，上党地区是炎帝神农氏传说的密集区。[①]优越的地理条件、民间大量的传说与祭拜习俗，方志中的记录都证明了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文明。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连续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留存有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文明以“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三大特征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



图1–5　丁村遗址



图1–6　丁村人打制石器加工厂



图1–7　丁村人砍砸器和大三角状石器

① 刘毓庆，柳杨：《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晋阳学刊》2005年4期。

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1.2 晋国伟业奠定了山西文明的基石

在悠久绵延的山西文明中，晋国文化是山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的品牌文化。据《史记·晋世家》及有关史书记载，在山西翼城、曲沃一带，商朝时有一个小方国被称为“唐国”，传说是帝尧后裔的一支。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西周初，周成王“桐叶封弟”，封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为当时重要封国之一。因国都在晋水旁，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晋”从此成为山西的代称。而三晋之地，大体相当于通常说的中原黄河流域。晋国传36代，有史673年。历代晋王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践土会盟，文公称霸；其后纵横中原，九合诸侯，成就百年霸业。

晋国六百年伟业，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晋国在“尊王攘夷”、争霸中原的过程中对周王室的继续存在和中原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山西“表里山河”，自古是戎狄民族同华夏民族交流、交往的南北天然通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成为不同民族错居杂住的集中分布区。西周初年，晋国初封，“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①]，“戎狄之民族环之”[②]，位于山西南部“汾河之东方百里”的晋国自立国始即处于戎狄民族环抱之中。马长寿说：“晋国的古代居民占大多数的并不是华夏，而是华夏以外的戎狄部落或部落集团。”至于山西全境，梁启超曾说过：“今，山西一省，当晋霸未兴之前，殆全属狄族势力范围。”苏秉琦也指出：“山西省古代是个复杂的地方。说起复杂，就是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他在论述“晋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写道：“晋文化发展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晋国虽然西周的色彩很浓，但仍然是个土著国家，当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主要的，晋文化不是周人传统，而是北方传统。”由于地近戎狄，民族杂居，山西的文化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胡服射骑就代表着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汲取与融合。由于晋开国时注意“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还促进法家的兴起。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为改革治世、富国强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从另一角度看，山西历史的发展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熔炉的作用，谱写着民族大融合的

①《左传·昭公十五年》。

②《国语·晋语二》。

辉煌篇章。

关于古老的“晋”字的写法，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晋”字像一个插满箭的箭囊，以此纪念唐叔虞——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史书上查到关于叔虞善射的记载；另一种是说“晋”字如同一个大鼎里插着禾苗，象征着祭天——在古代，祭祀是一项无限崇高的重要活动。不管是善射，还是注重农耕，都是先祖曾经励精图治的历史符号。

1.3　晋国崛起

《史记·晋世家》记载：“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①]认为晋都四迁，初都唐，后迁鄂，又迁曲沃，最后迁绛。晋是周的分封国，与宗周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各分封国地方特色不鲜明，几乎与宗周文化同步发展，与宗周文化大同小异。

自叔虞封唐，晋国先后经历了“文侯勤王”“曲沃代翼”“献公图霸”“城濮之战”“践土会盟”等历史事件，才最终成就了“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千古佳话。鼎盛时期，晋国疆域辽阔，地跨晋、豫、冀、鲁，曾迁都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绛（即翼，今山西翼城）、新田（今山西侯马）等地。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死了在西周故地自立的携王，结束周王室长达21年的二王并立局面，周平王终于成了唯一正统。晋文侯为东周的缔造立下大功，受到平王奖赏。周平王还特作《文侯之命》一文，并赐晋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张，彤矢一百，卢弓一张，卢矢一百，马四匹”[②]，赞扬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的人，勉励晋文侯尽心辅佐王室。晋文侯因此获得辅佐天子、代王征伐的大权，趁机在汾水流域扩张晋国疆土，晋国开始崛起。趁机占领周携王领地在的莫、易（河北中部靠近山西）。通过勤王，晋文侯捞取了大量领地，晋国开始快速扩张。

春秋初，晋国内部出现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斗争。从晋昭侯元年（前745）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到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经过六七十年，才以旁支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新建的晋国充满活力，武公之子献公（前676—前651在位）大力扩张，曾伐灭耿、霍、魏、虞、虢等国，并战胜骊戎、赤狄等族。周朝分封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最初分封的晋国只是侯爵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国诸侯纷纷自称为公爵，晋国又出了一位晋文公。晋文公和晋文侯只是叫法上不同，称号同名。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前636

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6月。

② 出自《尚书》：《周书·文侯之命》。

年至前628年在位。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在军队中，晋文公设三军六卿，这一制度使军队职业化，晋国军队实力变强。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城濮之战，晋国打败楚国，大会诸侯，被周襄王正式赐命为霸主。以后像秦、齐这样的大国都无法与之对抗。能长期和晋较量的只有楚，但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两强更迭把持中原霸权的局面。

晋国六百年的霸业，是山西人的骄傲，同时晋国丰富的遗存为我们研究山西文明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及实物资料。晋国的始封地和中心区域晋南、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以及“晋侯墓地”“侯马晋国遗址”遗存丰厚，名扬中外，震动学界。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面积达10余平方千米。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揭露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其中晋国公族的“公墓”，即名满天下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从而确认了西周时期从燮父至文侯的9代晋侯，结束了2000余年关于晋国始封地的论争，证实这里即文献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公元前585年，“晋人谋去故绛。……晋迁于新田”[①]。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侯马发掘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城址、宗庙、墓葬、祭祀及手工作坊等遗址，初步勾勒出晋国晚期繁华都城的面貌。铸铜作坊和侯马盟书是晋都遗址最重大的发现。



图1-8　晋阳古城遗址石碑

1.4　晋阳文明

晋阳（图1-8、图1-9）是太原的前身，位于山西中部太原盆地的北缘。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史称“六卿专政”。根据《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于晋顷公九年（前517）至晋出公十七年（前485年）以正卿主政晋国长达30年之久，挟强大武装，纵横中原，匡合诸侯，争执牛耳；铸刑鼎，纳阳虎，风云当时。赵简子还以战略“保障”目的营建了晋阳城。

就新石器中晚期形成的古代各民族分布区域看，晋阳所在的山西中部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分布的南沿和中原农耕民族分布的北沿，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华夏）两大民族频繁交往

①《左传·成公六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